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张懋镕 主编

青铜敦卷

谷朝旭 著

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张懋镕 主编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青铜敦卷

谷朝旭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青铜敦卷 / 张懋镛主编; 谷朝旭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11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ISBN 978-7-03-050741-9

I. ①中… II. ①张… ②谷…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4362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3

字数: 308 000

定价: 18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工作，多卷本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即将出版。回顾往事，真是百感交集。

30年前，我的处女作《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发表，从那时候起，青铜器的学习与研究注定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29年前，我开始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中国古文字有很多分支，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文字。先生告诉我：“你在陕西，陕西有很多青铜器，你就做金文研究吧。”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令我终生受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就是从青铜器、古文字、历史文献三方面来研究。从此综合研究成为我研究青铜器遵循的准则与方法。

1989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成立新的专业——博物馆专业，大概考虑到我本科学的是考古，于是把我从文献专业调到博物馆专业。除了继续讲古文字，又开了一门新课“青铜器鉴定”。自此之后，我开始系统研习青铜器，包括没有铭文的青铜器。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渐渐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了新的认识。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自两宋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百年来的研究，在青铜器的分期、分区系、分国别、分器类诸方面卓有成效，为世人所瞩目。

回顾历史，也毋庸讳言，我认为就青铜器基础性工作而言，其资料的整理还远远不够。且提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究竟有多少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尚且没有涉及兵器、工具、车马器、钱币、铜镜等）几万还是十几万，恐怕连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都没有，专家也说不清楚。家底不清，研究对象模糊，研究很难继续深入。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十分庞杂，其收集、整理并非易事，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非常重要。说到研究，比如青铜器的定名，鼎、鬲、簋等各类器物的分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类纹饰的分类研究，纹饰和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阶段铭文的特点，器物、纹饰、铭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断代的作用等等，其研究或不够系统，或不够深入，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

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写了《西周方座簋研究》《两周青铜鬲研究》《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等文章，希望从器类、断代、地域、定名等多个角度和层面对青铜器进行探索。

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成果，他们的论著是我案头的必备书籍，我经常地反复阅读，受益无穷。

在研究中，我深感个人力量的有限。从1999年招收青铜器方向研究生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构想：如果研究生本人没有更好的研究题目，我就请他来作青铜器中的某一部分，整理、研究某一类青铜器，或某一类纹饰，或某一时段的铭文，等等。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已经完成了20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分器类的整理与研究完成多半，某一地区、某一时段的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行，纹饰与铭文的分类、分时段研究也做了一部分。这些为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编撰奠定了基础。同时，我注意到其他先生也在指导研究生做类似的学位论文，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与帮助。

前几年，在编写《青铜器论文索引》的过程中，与北京线装书局的刘聪建先生多有接触。他听了我的上述介绍后，很感兴趣，遂与我商定，在原有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由我主编，各专题作者分别著述，形成一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线装书局只出了三卷。如今，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得以重新实现，拟在今后的若干年里，陆续完成和出版20卷以上的著作。

写作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目的拟在全面、系统整理青铜器资料，充分吸取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等方面作全方位考察和研究，并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产生、发展、消亡的基本途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近它。

由于这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作者都是毕业不久的研究生，眼界有限、文字青涩也在所难免。我的指导也很有限，很多问题我也不懂或知之甚少。当时作学位论文时，我希望他们放胆子去写，因此他们的观点与我也不尽一致。但无论如何，在阅读他们的学位论文时，在与他们的反复讨论、交流中，我也有很多的收获，这是最令人快乐的事情。我将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作为序言放在书前，就是希望继续与大家讨论，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延续下去。而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出版，这一批年轻的作者也正在走向成熟，这或许是比书稿的出版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要感谢参加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审阅论文的诸位先生，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批评与帮助。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暨历史文化学院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科学出版社李茜编辑的辛勤工作，让我们十几年来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乙未年立冬后二日张懋镛写于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青铜敦：非仿陶青铜器产生、演进的典型代表

（代序）

张懋镕

十年前，我们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以下简称《关系》）^①，归纳出青铜器器类之间的三种关系：派生关系、相生关系、更替关系。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的产生，如鼎、簋、爵、觯、盘、盃等大部分器类是模仿陶器而来的，但也有一部分器类如鬲、簠、敦、铺是在另一部分器类（簋、豆）的基础上衍生演化出来的，我们把后一种关系称之为派生关系。派生关系有利于像敦这样的新的器类的诞生。所谓相生关系是指两类不同的青铜器在发展演进过程中，由于形成一定的组合关系，因用途、功能相近的缘故，相互吸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在形制上介乎二者之间的新品种。相生关系的意义是产生了一批新形态，例如鼎、簋相生形成蹄足敦。通过相生关系有助于了解蹄足敦之类的新型式产生的原因和变化的轨迹。由此可见，青铜敦的产生既缘于派生关系，其演化又与相生关系有诸多关联，这种情况在其他青铜器器类中并不多见，而这也正是青铜敦能够成为青铜簠之后最重要的盛食器的原因之一。

以上认识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充分展开。而今谷朝旭的《青铜敦卷》杀青^②，为青铜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本文拟进一步讨论青铜敦的产生和演进的基本轨迹及其原因。

一、派生关系催生敦的产生

关于青铜敦是如何产生的，学者间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归为两种意见，一种看

① 张懋镕：《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33～141页。

② 凡是本文提及《青铜敦卷》的有关说法，请阅读该书，文中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法认为敦由簋演变而来，代表人物是高明^①、陈芳妹等先生^②。另一种看法认为敦由盆演变而来，主张者有彭裕商先生^③，刘彬徽先生将平底敦类器归入盆属^④，说明他也认为这类敦器来源于盆。

《青铜敦卷》认为敦来自簋，用我们的说法即青铜敦系由青铜簋派生而来。《青铜敦卷》指出，最早的青铜敦出现于春秋中期偏早阶段，如洛阳中州路M2415出土的涡纹敦、山东曲阜鲁国故城M202出土的素面敦、河南信阳平西村M5出土的絢纹敦、湖北随县出土的息子行敦等。似乎最早的铜敦可能产生于中原和山东地区。这种型式的铜敦属于《青铜敦卷》划分的甲类A型，“具有隆盖、圆腹的特征，与簋的形制相似，在形态上保留了较多的铜簋的特征”。当然《青铜敦卷》也承认敦同时又受到铜盆的影响，具有铜盆平底无足的特征。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比较合乎情理。另外还要补充两点。

第一，敦来源于簋的重要证据是敦继承了簋的优良特质，基本沿着簋的发展轨迹在逐步演进。簋的发展演变有一个基本规律：从商代早期开始出现的圈足簋，渐渐演化出西周早期的三足（或四足）簋，即在圈足或耳的下端或外侧附着三足或四足。到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时期，这种附足簋取代普通的圈足簋，成为簋的主流型式。无论铸造技术水平发展到何等地步，作为新出现的敦也经过了一个由相对简单（无足）到相对复杂的过程（圈足或长足）。敦在春秋中期初现时，簋已经越过了它的兴盛期，发展相当完备，各种类型都有，包括三足、四足簋，但敦还是从平底做起，春秋中期主要流行平底敦，过了一百年，到春秋晚期才出现三足、四足敦。由此足见簋对敦发展演进影响之巨大。

敦不仅继承了簋的诸多特质，而且还有发展。其中附足簋的比率值得注意。任雪莉博士认为：附足簋在形成伊始，可能受到了鼎的影响，这种长足对于加热食物来说却十分便捷。在3000多件青铜簋中，附足簋615件，占有的比率不算高，在20%左右^⑤。在盆、盥中占有的比率也不高。但在敦中占有的比率很高，据《青铜敦卷》统计，在出土的382件敦中，除过12件型式不明外，平底敦72件，有足敦298件，比率为80.5%。这说明敦的演化继承了簋的优良传统，越到后来越讲究功能的多样化，发展更为完善了。

第二，强调敦与盆的区别。如前所言，关于青铜敦的来源，有一种主张敦来自

①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中），《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② 陈芳妹：《簋与盂——簋与其它聚盛器关系研究之一》，《故宫学术季刊》第一卷第2期，1984年。

③ 彭裕商：《东周青铜盆、盥、敦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2期。

④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52~164页；《东周青铜敦研究》，《湖南博物馆文集》，岳麓书社，1991年。

⑤ 任雪莉：《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簋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94页。

盆。从形制来看，早期敦的颈部收缩，这一点很像盆，但是腹部圜收，这一点又像簋，不像盆，因为几乎所有盆的腹部都是从肩部开始斜收，如归父敦；几乎所有簋的腹部都不是从肩部开始斜收的，这是敦来自簋而不是盆的最重要的证据。敦的这一特征自始至终体现在敦的发展进程中，说明簋对敦的影响十分深远。

总之，簋自商代出现以来，一直发展到春秋中期，浩浩荡荡，气势磅礴，为敦的催生而蓄积能量；敦也因此而根深叶茂，一旦问世，便发展迅猛，势不可挡。

二、相生关系成就敦的辉煌

据《青铜敦卷》统计，出土和传世的敦总共416件，仅从数量来看，并不算很多。但敦的影响很大，流传时间长，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流传地域广，遍及长江南北，所以研究者都认为青铜敦是青铜簋之后最重要的盛食器。为什么青铜敦会如此杰出？青铜簋也有400多件，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晚期，流传时间比青铜敦还要长，但影响却不及青铜敦。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相生关系成就了敦的辉煌。

对于一些器类来说，相生关系都是发展、兴旺的重要推手。譬如盨与鼎相生产生鼎形盨，但是数量很少，影响有限。而敦不同，它的适应性强，与很多器类相生，产生出不少非驴非马的器物来，甚至让人难以分辨。主要有如下几个类型^①：

（1）盆形敦。所谓盆形敦就是形制像盆的一种平底敦；即《青铜敦卷》所分甲类敦的A型，是敦与盆相生的产物。基本形制为：盖器扣合呈圆形，盖小器大，下为平底，腹部两侧有一对环耳。盆形敦出现在春秋中期早段，例子是中州路M2415出土的涡纹敦，是最早出现的一种型式的敦（图一）。青铜盆虽然初现于西周中期，但受到簋、盨、簠的压制，在西周时期一直得不到较大的发展空间^②。春秋早期和中期，随着盨的衰落，簠也开始走下坡路，此时正是青铜盆流行的时候，盆形敦也应运而生。当青铜盆在战国早期式微，盆形敦也随之消失。盆形敦是敦从簋派生之后，第一次与其他器物发生相生关系的新品种，因此在敦的早期发展历程中，盆形敦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里顺便谈谈1976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息子行敦^③（图二）。因为这件器物的形制与青铜盆近，隆起的盖上有圈形捉手，平沿束颈，平底，腹两侧有一对环耳，加上自

① 路国权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北京大学，2014年）中将敦划分为四个类型，A型是盆形敦，B型是盨形敦（即我们所说的盨形敦），C型是豆形敦，D型是球形敦，总体思路与我们相近。

② 张懋镛：《青铜盆小议》，《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28～132页；《再议青铜盆——从新发现的中市父盆谈起》，《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64～169页。

③ 程欣人：《随县涇阳出土楚、曾、息青铜器》，《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名为盆，所以一般论著均认为它是敦（《商周》06262）^①。其实它是敦与盆的相生生物。说它是敦，如前所言，最主要的证据是腹部圆缓内收，这是一般盆没有的特征，却是敦的主要特征之一。我们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呢？请看河北唐县出土的归父敦（图三）。此器盖面隆起程度较高，上有圈形捉手，颈部收缩，折肩鼓腹，平底微圜，口沿外侧左右各附一环形耳。盖内面有铭文两行共11字：“鲁子中之子归父，为其膳敦。”通高16.5、器盖高7.1、口径23.3厘米^②。时代为春秋中期偏晚。从外形看，此器与息子行敦非常相似。如果固守自名原则，息子行敦应是盆，归父敦自然是敦，二者岂不矛盾？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自名现象很复杂，要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一味盲从^③。在息子行敦和归父敦都有自名且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遵从考古学类型学的原则，先分析它们的形制特点。因为两者都符合敦的基本形制即腹部圆缓内收，所以它们都是敦，而不是盆。器身与息子行敦和归父敦形态一致的还有益余敦（《商周》06076），其自名“善（膳）敦”，齐侯敦（《商周》06072）也自名“善（膳）敦”，亦可证明我们称息子行敦为敦是有充分依据的。显然，大部分自名是可靠的，至于息子行敦自名为盆，只是说明这种类型的敦曾经受到盆的影响。

如果从这种平底敦的发展轨迹来看，就更清楚了。归父敦即《青铜敦卷》所分甲类敦的Aa型，它的发展趋向就是Ab型。《青铜敦卷》将Ab型分成三式。Ⅰ式标本是洛阳中州路M1出土的素面敦^④（图四）。大致形态与归父敦相近，譬如作为盆式敦的主要特征的束颈还保留着，但是也有一些变化，如盖面隆起不高，原先的圈形捉手变成三环纽。年代在春秋中期偏晚。发展到Ⅲ式，这种盆式敦就起了质的变化，如山东莒南大店M1出土的蟠虺纹敦，虽然与中州路M1出土的素面敦形近，盖上也有三环纽^⑤，但重要的区分是已经没有明显的颈部（图五）。如果单独来看莒南大店M1出土的素面敦，已经看不出它与盆有什么关系了。莒南大店M1出土的素面敦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晚，可见此时盆对于敦的影响已经很少了。



图一 涡纹敦

（中州路M2415：7）



图二 息子行敦

①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本文简称《商周》。

② 王敏之：《河北唐县出土西周归父敦》，《文物》1985年第6期。

③ 张懋镛：《试论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128～138页。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93页。

⑤ 山东省博物馆等：《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图三 归父敦



图四 素面敦

(中州路M1:2)

从息子行敦到莒南大店M1出土的素面敦，我们看到早期的青铜敦如何接受盆的影响，又如何借鉴盆的形态以求生存。甲类A型盆形敦是早期敦的主要型式，数量也不少，有72件，占出土敦总数的19.4%。作为一种非标准敦的型式，盆形敦处于孕育、派生出敦的关键阶段，在推动非标准敦向标准敦演进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2) 孟形敦。当盆式敦在春秋中期偏早至春秋晚期流行时，又有一种型式的敦兴起，这就是孟形敦。前者主要流行在中原地区，后者主要流行在楚地。

孟形敦即《青铜敦卷》所分Ba型，实际上是在A型平底敦的基础上加了三足或四足，可以看做平底敦的一种自然延续。这种敦，通常叫盞式敦。以往有人喜欢谈论盞式敦，用盞来命名，似乎它是一个特点分明的类型，其实不然，自名为盞的敦的内涵并不纯粹，既包括《青铜敦卷》所分乙类的圆体敦，如大府敦（《商周》06055），也包括甲类的盞式敦。盞是敦在楚地的一种区域性称呼，在对敦的区域性研究时有用，但是在分类上用处不大。所谓盞式敦有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球形敦，器盖相合呈球状，是标准的敦的形状，与孟的形态已相去较远。其中又可以分两小类，一小类是足作环纽状者，如仲姬鬲敦（《商周》06054），铭曰：“仲姬鬲之盞”（图六），大府敦（《商周》06055），铭曰：“大府之馈盞。”昭之王孙即敦（《商周续编》0525）^①，铭曰：“昭之王孙即自作飮盞。”但这种类型的敦也有自名为孟的，如许子敦，铭曰：“许子口之盞孟。”（《商周》06058）（图七）单独来看许子敦，恐怕难以想象它与孟有什么关系。另一小类是足作蹄足状，如襄王孙敦（《商周》06068），铭曰：“襄王孙口嫺择其吉金，自作飮盞。”（图八）形状显然与孟没多大瓜葛。

第二类是鼎形敦。下腹有三蹄足，足较长，与孟形敦的蹄足还有所不同，形态近于鼎。如賁于嘏敦（《商周》06059），铭曰：“賁于嘏之行盞。”（图九）这类敦将



图五 蟠虺纹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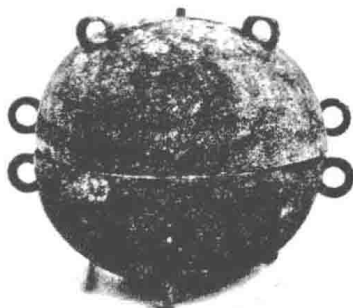
(莒南大店M1:15)

①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本文简称《商周续编》。

放在后面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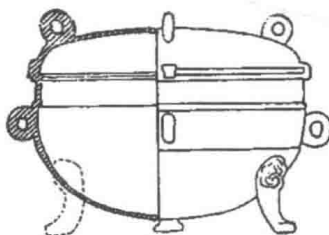
图六 仲姬彥敦



图七 许子敦



图八 襄王孙敦



图九 賡于噉敦

第三类才是真正的盂形敦，多自名为盂。如楚王畬审敦（《商周》06056），铭曰：“楚王畬审之盂。”（图一〇）愠儿敦（《商周》06063），铭曰：“愠儿自作铸其盂。”黄子婁敦（《商周续编》0523），铭曰：“黄子婁以作叔半盂。”或自名为盞，如穀儿敦（《商周续编》0524），铭曰：“穀儿择其吉金，自作飮盞。”陈子侯敦（《商周续编》0526），铭曰：“陈子侯择其吉金，自作飮盞。”以上诸器年代均在春秋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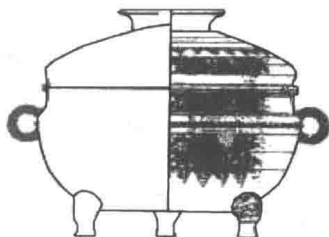
由上述例子可知，盞的内涵复杂。它之所以有“盞”这个总的名称，主要是因为它们出土在楚地。如仲姬彥盞在1990年出土于河南淅川和尚岭二号墓，大府盞在1933年出土于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賡于噉盞1976年出土于湖北随县义地岗，愠儿盞1986年出土于湖南岳阳莲塘村，襄王孙盞1997年出土于湖北谷城过山镇。昭之王孙即盞的主人是楚昭王之孙，自然是楚器。春秋晚期许国已为楚国所灭，成为其附庸，许子盞盂出土于河南南阳市，有浓郁的楚文化色彩。总而言之，“盞”只是敦的一种地方性称谓，过去用“盞”来为敦划分型式，其实是不科学的。

本节要谈的是盂形敦，即《青铜敦卷》划分的Ba型：隆盖上置圈状捉手，下承三小矮足。根据器底形态及器腹的不同分为三式。从前面所说青铜器发展的一般规律，先是平底，然后才有足，可见在盆式敦流行一段时间后，盂形敦出现了，进一步推动了敦的演化。除了前面列举的有铭文的盂形敦，还有没有铭文的盂形敦，如《青铜敦卷》所举I式的河南淅川下寺M7出土的蟠螭纹敦，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晚（图一一）。湖北钟祥黄土坡东周墓M31出土三角纹敦，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晚。可见这种型式的敦

还是流行于楚地。结合前面所述青铜敦的年代，孟形敦主要流行在春秋中期偏晚至春秋晚期。



图一〇 楚王禽审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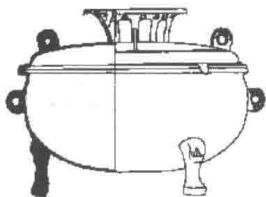
图一一 蟠螭纹敦

（下寺M7：8）

孟形敦虽然主要流行于楚地，但对于中原地区的敦也产生很大影响。正如《青铜敦卷》所说的山西临猗程村M0022出土的铜敦、山东泰安市黄花岭村出土的铜敦、河南新郑蔡庄M37出土的铜敦、河南新郑铁岭墓地M1404出土的凸弦纹敦（图一二），应是受楚地文化影响所致。至于1990年湖北襄阳朱坡乡徐庄村出土的簠子匱敦更有意义（《商周》06075）^①（图一三）。此器主人舒子敢原本是群舒人，可能在楚灭群舒之后，成为楚的附庸。原本群舒没有这样的器形，当是受到楚文化影响后的产物，与一般的楚国孟形敦没有什么差别。而器盖上所饰环带纹，则不见于其他楚器上，似乎在表明此器文化的多元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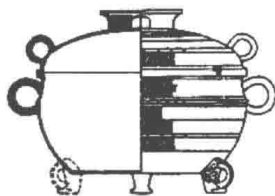
《青铜敦卷》所分Ba型Ⅲ式敦接近标准的孟形敦。中原与楚地孟形敦相比，两者相同的是：盖顶捉手均为圈形，颈部收缩，腹部圆鼓。不同的是：前者变平底为圜底，附足也较高。中原地区的孟形敦与楚文化区的孟型敦既有联系又有区分，可以看做楚地孟形敦在中原地区的变异。

相比于盆形敦，孟形敦的数量不算多，有62件，占出土敦总数的16.8%。不仅行用地区扩大了，从中原到楚地，而且流行时间较长，从春秋中期偏晚到战国早期，在形制上更接近于标准敦，在敦由非标准向标准敦转化的过程中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孟形敦处于非标准敦和标准敦中间，形态多变，盖、耳、足各有千秋，加上纹饰精细华美，在敦中十分耀眼，为敦类器增色不少。



图一二 凸弦纹敦

（新郑铁岭墓地M1404：13）



图一三 簠子匱敦

^① 吉林大学古籍所的张水根博士写有《舒子匱盖铭文考释》一文，曾寄来商讨，考释此器为舒国青铜器，窃以为很有说服力。

(3) 鼎形敦。是敦与鼎相生后的产物，即《青铜敦卷》所分甲类Bb、Bc型和乙类A型。之所以说它是鼎形敦，首先是器盖相合呈球状体或接近于球状体，其次是器底有足，有蹄足也有环耳形足，有的足还比较长，与同时期的鼎像。开始出现的型式如甲类Bb、Bc型和乙类Aa、Ab型还不大像鼎，越到后来越像，最像鼎的是Ad、Ae型，出现的时间也最晚，说明这种相生有一个过程。同时也证明我们所说的相生关系在事实上是存在的。Ad、Ae型铜敦的数量很少，但甲类Bb、Bc型和乙类Aa、Ab型青铜敦的数量很多，一共有226件，占出土青铜敦总数的61%，可见鼎形敦在青铜敦类器中的重要地位。其实前面说过的盂形敦，从其足来看，也不能说它没有受到过鼎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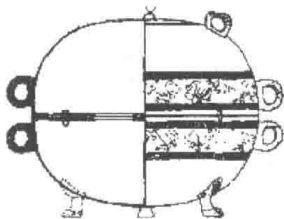
关于鼎形敦，也有学者主张是从鼎演化出来的。诚然，像俗称西瓜鼎（主要指Ae型）那样的敦必定是受了鼎的影响，但其数量少，而且更重要的是出现的年代比较晚，是在敦成熟之后受鼎影响所致。年代较早的敦，如盆形敦、盂形敦，其形态都与簋相仿，直接承袭簋而来。

鼎形敦有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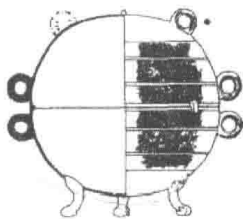
第一类是标准型敦。这一类又可以分三型。

扁球型，器盖相合呈扁球状，盖与器身都比较浅，相合之后高度小于器的宽度。扁球型即《青铜敦卷》所分乙类敦的Aa型1式、Ab型1式、Ac型1式。标本是湖北麻城市李家湾M14出土涡纹敦（图一四）、湖北襄阳余岗山湾M22出土素面敦，年代为春秋晚期。这一类型的青铜敦还有《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中编号为A286、A287的两件青铜敦^①。

圆球型，器盖相合像一只足球，盖与器身的深度一样，相合之后高度等于器的宽度。圆球型即《青铜敦卷》所分乙类敦的Aa型2式、Ab型2式、Ac型2式，标本有河南浙川下寺M10出土的涡纹敦（图一五）。



图一四 涡纹敦
(麻城李家湾M14:2)



图一五 涡纹敦
(下寺M10: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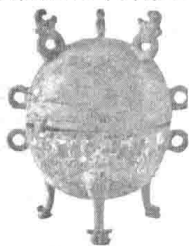
竖蛋型，器盖相合像一只竖立的鸡蛋，盖与器身都比较深，相合之后高度大于器的宽度。竖蛋型即《青铜敦卷》所分乙类敦的Aa型3式、Ab型3式、Ac型3式，标本是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镶嵌龙纹敦（图一六）。这一类型敦还有《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中编号为A288、A289的青铜敦。

^① 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

第二小类是非标准型敦，其中又分三型。

A型，即《青铜敦卷》所分甲类Bb型，虽然与甲类Ba型有关系，同样是在A型平底敦的基础上加了三足或四足，可以看做平底敦的一种自然延续，但因为足比较长，直接腹底，与鼎的腹与足相似，应是受到鼎的影响所致。

标本有河南洛阳中州路M4出土的蟠螭纹敦、山西临猗程村M1082出土的麻点纹敦（图一七）、山东长清仙人台M5出土的蟠螭纹敦、2007年河南新郑铁岭墓地M308出土的蟠螭纹敦。主要特征是盖隆起，上有三环纽。这种装饰，不同于早先出现的盆式敦和盂形敦，反而与鼎的形态接近。时代为春秋中期偏晚。一直流行至战国早期。主要发现于中原的洛阳及晋南地区。



图一六 镶嵌龙纹敦



图一七 麻点纹敦

（临猗程村M1082：9）

B型，即《青铜敦卷》所分甲类Bc型，也与Bb型一样，处于从非标准型敦向标准型敦演进的中间阶段。与盆形敦相同的是：颈部收缩，说明它还保留一些敦的早期形态。同时，它与盆形敦不同：盖顶有三个或四个蹄足纽，与器腹的三小足或四小足对称。这种对称的造型艺术正是敦的特质。标本有1987年山东省胶南县博物馆征集的荆公孙敦（图一八）。盖内有铭文：“荆公孙铸其膳敦”（《商周》06069-70），也说明它具备更多敦的因素。此型蹄足敦大多出于山东，与中原及楚地的敦不同，但演进的基本规律是一致的。以上几件敦彼此形态、纹饰非常接近，其中山东出土7件，河北2件，大多出于山东。《青铜敦卷》指出这是山东地区特有的类型，出现于春秋晚期，下限为战国早期，这很正确。只有一件河北怀来甘子堡M2出土乳钉纹敦与其他8件有所差别，即盖顶上的纽不是蹄足而是环纽（图一九）。由于燕地没有这种型式的敦，所以《青铜敦卷》认为燕地的这种敦可能是受齐文化的影响而产生或直接从齐地输入的。有趣的是，同样在河北，平山县穆家庄M8102出土的乳钉纹敦与山东出土的乳钉纹敦一样，而距离比较遥远的怀来出土的敦就有了差别。这对于我们研究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器物演变有益。

这一类型的演变规律，如《青铜敦卷》所说：于平底发展为圜底，束颈消失，同时器腹弧度增大，盖面进一步隆起，从而使器盖相合更接近扁圆体。这一演进生动地说明非标准型敦是如何一步一步向标准型敦靠近，对于我们了解标准型敦的来源有重要参考价值。

鼎形敦是鼎与敦相生的产物，从敦的角度来看，则是敦受到鼎的影响，形态趋向于鼎。在西周时期，簋也曾经受到鼎的影响，形成附足簋，但附足簋除了足长一点，与鼎的形态还是有相当距离。然而鼎形敦不同，不但作为球状的器身，连盖上的纽，都与鼎非常相似。在与鼎形成组合关系的饪食器中，没有其他器类像鼎形敦那样更接近鼎的形态了。

或许是与鼎相近的缘故，相当一部分鼎形敦不仅体量大，而且装饰华丽，颇为引人注目，无疑提升了敦的地位。鼎形敦数量很多，它的出现，标志着敦的自身型式的完善，敦在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敦的发展也步入全盛阶段。



图一八 荆公孙敦



图一九 乳钉纹敦

(甘子堡M2:6)

(4) 簋形敦。所谓簋形敦就是形制像簋的一种敦，是敦、簋相生的产物，即《青铜敦卷》所分的乙类B型。盖、器同形，盖顶有圈形捉手，器底有形制相同的矮圈足。盖、器大小相同，皆有二环耳。标本有河南陕县M2040出土的涡纹敦，年代为战国早期（图二〇）；1959~1961年山西长治分水岭M26出土的涡纹敦，年代为战国中期；此型铜敦时代较早的有《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中收录的编号为A285的青铜敦，形制基本相同，唯器耳有异。年代为春秋晚期。簋形敦出现于春秋晚期，下限为战国中期。这种类型的青铜敦数量极少，只有9件，主要发现于中原地区，应为中原地区的一种特殊类型。

簋形敦就像两个簋器相扣合。单从器身来看，与一般的圈足簋无差别，但从盖与器身形制一样，器、盖扣合的方式来看，则是敦的特色。可以说簋形敦是簋、敦相生的产物，是簋、敦结合的完美体现。敦不仅是簋的派生物，而且与簋相生产生簋形敦，这种现象在其他器类中很少见，反映了敦在派生与相生的双重作用下，能产生更多的型式，从而加速了敦的蓬勃发展。

(5) 豆形敦。所谓豆形敦就是形制像豆的一种敦，是敦、豆相生的产物。

《青铜敦卷》中披露一件方形铜敦，系2008年河南省南阳市八一路楚彭氏家族墓地一号墓出土。通高26、口长26、口宽26厘米。形制很特别，盖、器均作方斗形，上下相扣，如同一只皮箱。盖面上四角处各有一兽首形环纽，器底有对应的四个外撇的兽蹄形足。器身与盖的四面中心处有上下对应的环耳。盖沿四边各有两个兽面形卡扣，用来卡住器口（图二一）。时代为春秋晚期。



图二〇 涡纹敦

(陕县M2040: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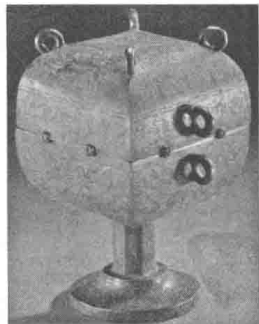


图二一 蟠螭纹方敦

正如《青铜敦卷》所言，这种方形铜敦目前仅见此一例，是很珍贵的资料，其形制显然是受到了方豆的影响^①。

我们曾经说过，相生物的产生，有一个条件，就是形成相生关系的双方必须具有强大的资源优势^②。如前所言，春秋晚期青铜敦已经步入它的黄金时代，数量多，质量高，行用地区广，在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关系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常常与鼎组合成为饪食器的核心。同时，青铜豆的发展也在春秋晚期到了顶峰，在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关系中，常常与鼎组合成为饪食器的核心，地位与敦仿佛。敦与豆在同一阶层的频繁相遇，导致豆形敦的出现。

为什么这件独一无二的方形敦出现在河南南阳，而不是其他地方呢？我们不妨先看看方豆流行的区域。张翀在《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豆卷》中所分Bg型豆就是方腹型豆，腹部呈方形^③。这类方腹铜豆流行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器物有河南固始侯古堆所出的两件方豆^④（图二二），擂鼓墩二号墓出土的一件素面方豆^⑤、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一件嵌绿松



图二二 镶嵌兽纹方豆

① 路国权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北京大学，2014年）中将敦划分为四个类型，其中C型是带柄敦，也称之为豆形敦（见该论文122~126、132页）。将以往我们认为的一批豆归属敦。这种观点很新颖，但值得商榷，因为豆（包括铺）与其他器类的最大差别在于豆有柄，而敦恰恰没有柄。只有一件梁伯可忌豆自名为敦（《商周》06152），若依此作为例证，也是孤证，况且我们已经著文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现象是器类之间相生关系的反映，不能盲从自名来定名。

② 张懋镛：《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35页。

③ 张翀：《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豆卷》，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④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⑤ 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

石方豆^①、藤店一号墓所出两件铜方豆^②。可见，方豆流行的区域主要在楚地，而楚地也同时流行敦，于是两者相互影响，从而促成豆形敦的出现。以前我们知道敦与盆、鼎、孟、簋发生关系，如今又发现敦与豆也能发生关系，产生新的品种，可见敦在演进历程中，是如何活力四射，不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敦在演进过程中，分别与盆、鼎、孟、簋、豆发生关系，产生以上如此众多的新品种。在这一点上，盛食器中唯有簋能抗衡，演化出盆形簋、鼎形簋、孟形簋、豆形簋。敦具有与簋一样的秉性，由此也可判断，说敦源自簋，应该无错。

三、结 语

青铜敦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轨迹大致是：在春秋中期偏早阶段，青铜敦从青铜簋中派生出来，并相继受到青铜盆和青铜孟的影响，产生盆形敦和孟形敦。春秋晚期是盆形敦和孟形敦发展的高峰期，不仅数量剧增，行用地区也越发广大。盆形敦主要流行于中原，孟形敦主要流行于楚地。在盆形敦和孟形敦盛行时，有一部分敦受到鼎的影响，足开始加长，器身也向球体发展，形成标准型的青铜敦。此类球体敦流行于中原和楚地两大区域。进入战国，盆形敦和孟形敦、非标准型的球体敦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标准型的球体敦则继续发展。此时敦的型式趋向单调，也意味着敦开始走近衰落。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青铜敦的产生得力于青铜簋，青铜敦的发展得力于盆、孟、鼎、簋、豆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帮助青铜敦改头换面，产生出一批又一批新品种、新类型来。青铜敦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器类之间的相生关系在起着助推作用。如果没有相生关系，便没有盆形敦、孟形敦、鼎形敦、簋形敦、豆形敦，没有了这些型式的敦，青铜敦还能剩下什么呢？

附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夏商周青铜礼器的兴衰及其原因》（立项号：15B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八册，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一七九，157页。

②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